

高斯坦 / 主编

肖宪 / 等译

中国与 犹太—以色列 关系100年

CHINA-JEWS-ISRAEL,
1903-2003: A HUNDRED YEAR
RETROSPECTIV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与 犹太—以色列 关系100年

CHINA-JEWS-ISRAEL,
1903-2003: A HUNDRED YEAR
RETROSPECTIVE

ISBN 7-5004-5232-2



9 787500 452324 >

ISBN 7-5004-5232-2 定价: 23.00元

中国与 犹太—以色列 关系100年

CHINA-JEWS-ISRAEL,
1903-2003: A HUNDRED YEAR
RETROSPECTIVE

高斯坦/主编
肖宪/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与犹太—以色列关系 100 年/高斯坦主编;肖宪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8

ISBN 7-5004-5232-2

I. 中… II. ①高…②肖… III. 中外关系—国际关系
史—以色列 IV. D829.3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5852 号

图字 01-2005-4749

责任编辑 丁玉灵
责任校对 周 昊
封面设计 毛国宣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9.125

插 页 2

字 数 219 千字

定 价 23.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简介

本书全面勾勒了自20世纪初至21世纪初中国与犹太民族组织及以色列国的历史与政治关系，重点探讨了中国国民政府时期的中犹关系、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中以关系、建交前后的中以关系，以及以色列共产党对华政策，中国香港在中以关系中的作用等问题，披露了不少新历史资料。本书还对中国对中东地区的政策、中东安全平衡中的中国因素等作了专题讨论。

China-Jews-Israel, 1903 – 2003 : A Hundred Year Retrospective

edited by Jonathan Goldstein

中国与犹太—以色列关系 100 年

高斯坦 主编

本书中文版权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所有



本书主编高斯坦教授与译者肖宪教授合影

鸣 谢

谨以此书献给教导我有关锡安主义的老师们：罗兰德·吉特尔森拉比（Rabbi Roland Gittelsohn）、塞缪尔·涅姆佐夫（Samuel Nemzoff）和我的父亲大卫·高斯坦（David Goldstein）及摩西·伊加尔博士（Dr. Moshe Yegar），对诸君之指导与鼓励，深致谢意。

本书完成出版多承家母米瑞安·萨尔贡（Miriam B. Sargon）的关怀督促，谨此致谢。

我深切希望本书出版后对促进今后中国和以色列友好关系有所增益。

由于现任特拉维夫大学东亚事务系夏尔·埃森伯格（Shoul N. Eisenberg）讲座教授阿隆·夏（Professor Aron Shai）首先慷慨捐助，继之又有下列捐资，才使本书之中文译本得以问世，谨在此深表谢意：

- 美国埃默利大学（Emory University）犹太研究促进基金会
- 美国犹太历史委员会亚洲及环太平洋研究所
- 里奇（Rich）文化教育福利基金会

· 迈克尔·弗伦德（Michael Freund）为纪念其祖父也对本书进行了捐助，他的祖父哈里·罗森塞尔（Harry Rosenthal）生前曾多次因商务前往中国，并高度赞扬这个国家。

江纳森·高斯坦

2004年5月于特拉维夫

אני מקדיש ספר זה למורים שלימדוני ציונות מהי: הרב רולנד ב. גיטלסון ז"ל; שמואל גמזוף ז"ל; ד"ר משה יגר; והורי דוד גולדשטיין ז"ל ומרים ב. סרגון. כולי תקווה כי ספר זה יתרום למען קידומה של הידידות בין סין ובין ישראל. הוצאתו לאור של תרגום זה התאפשר הודות לנדיבותם של:

קתדרת שאול נ. אייזנברג ללימודי מזרח אסיה שבאוניברסיטת תל-אביב, וליושב-ראשה הנוכחי פרופ' אהרון שי

ובנוסף מענקים מהקרן להעשרת לימודי היהדות של אוניברסיטת אמורי; המכון האסיאתי-פאסיפי של המועצה היהודית של אמריקה; קרן ריץ' לתרבות, חינוך ורווחה; ומיכאל פרוינד - לזכר סבו הארי רוזנטל, שנסע לסין לעתים קרובות בענייני עסקיו ותמיד דיבר בה גבוהה.

--יונתן גולדשטיין
תל-אביב, סיוון התשס"ד

I dedicate this book to my teachers about Zionism; Rabbi Roland B. Gittelsohn z"l; Samuel Nemzoff z"l; Dr. Moshe Yegar; and my parents David Goldstein z"l and Miriam B. Sargon. I hope that this book will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Israel.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translation was made possible through the initial generosity of

The Shoul N. Eisenberg Chair for East Asian Affairs of Tel Aviv University and its current chair holder Professor Aron Shai

plus subsequent gifts from the Jewish Studies Enrichment Fund of Emory University; the Asian and Pacific Rim Institute of the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the Rich Foundation for Culture, Education, and Welfare; and Michael Freund in memory of his grandfather Harry Rosenthal, who often traveled to China on business and always spoke highly of the country.

——Jonathan Goldstein

Tel Aviv, May 2004

前 言

江纳森·高斯坦 (Jonathan Goldstein)

本书回顾了位于亚洲大陆两端的中国和以色列之间五十年来
的关系。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且数千年来一直是一个大国，而
以色列则是一个现代国家。她诞生于联合国大会 1947 年 11 月
29 日关于对英国委任统治地巴勒斯坦划分为犹太国和阿拉伯国
的决议。本书包括 1948 年之前中华民国的领导者们与犹太国家
的缔造者们之间，以及之后的以色列与 1949 年宣告成立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等内容。本书有其双重目的：一是叙述
20 世纪中国历史和犹太历史的相互关系；二是叙述锡安主义历
史的一个方面。锡安主义是 19 世纪和 20 世纪中犹太人和非犹太
人所致力一个运动，其目标是在犹太人因公元 1 世纪被罗马人
驱逐而离开的土地上重建犹太人的家园。而本前言的目的则是为
非专业人士简要介绍一些相关的现代中国和犹太人的历史，以及
简要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和章节。

中华民国是孙逸仙博士和其他人于 1911 年 10 月 10 日推翻
满清王朝后建立起来的。直到 1949 年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
等人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推翻为止，它一直统治着中国大陆。中
华民国被推翻之日，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译者：以下简称中

国)成立之时。中华民国则逃到海岛台湾,台湾在过去的45年里曾是日本的殖民地。^[1]本书的作者们试图这样来勾画中—以关系: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早期的中—以关系主要是变化不定的;从50年代早期到70年代,以色列与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都处于冻结状态;80年代处于转变之中;1992年1月以色列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为全面的外交关系;1992年2月之后以色列与台湾成为“正式的非官方”关系;从那以后,这种建立起来的基本关系得到了全面的发展。

本书还探讨了影响中—以关系的其他国家的各种利益关系。澳门和香港是中国的领土,分别自1557年和1842年为葡萄牙和英国统治。在处理对澳门和香港关系问题上,以色列多年来受制于这些欧洲国家。对中—以关系影响更大的是以色列、台湾地区、中国与那些伊斯兰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的关系,这些国家包括:埃及和叙利亚(两国一度组成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印度尼西亚(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国家,曾于1955年4月18—24日在万隆举行具有历史意义的亚非会议)、约旦、黎巴嫩、巴基斯坦(亚非会议的倡导者之一)、土耳其及海湾石油输出国。此外,中—以关系还受到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而美国本身也在中国和台湾地区之间荡秋千。中以关系也受苏联外交政策的影响,苏联直到1991年2月崩溃为止一直是美国的全球竞争对手。这一关系也受印度外交政策的影响,印度对中国支持其对手巴基斯坦的做法深感不满,并同中国为争取那些与美国或苏联关系都不太密切的伊斯兰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而展开竞争。从1948年至1992年,中国、台湾地区以及印度均采取反以政策。这都是它们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目的是为了赢得伊斯兰国家和第三世界不结盟国家的友谊。

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由于中国不断向阿拉伯国家

示好，不断升级其反以言辞，以色列和台湾这两个国际“弃儿”日益靠拢，并同时被中国、阿拉伯国家及其盟友排斥在亚非国家的圈子之外。对此，读者也可参阅戴维·金奇和迈克尔·布雷切尔这两位政治学家的著作，他们曾对一些亚洲国家将以色列和台湾排斥在亚洲之外的努力进行过研究。“亚非主义”有其自相矛盾之处，即亚非“运动”一方面宣称反对殖民主义，而另一方面却对印度在克什米尔、印度尼西亚在东帝汶及苏联在阿富汗的行为避而不责。该运动还对这一事实熟视无睹，即尽管台湾地区和以色列的历史背景不同，但两者均曾是殖民主义的受害者；台湾地区于1945年摆脱了日本50年的殖民统治，而以色列也于1948年从英国的委任统治下诞生。〔2〕

万隆会议是国际社会孤立以色列的第一个重要表现。本书第一章全面讨论了这个问题。万隆会议也许是阻碍1950—1992年间中—以关系的最大障碍，并且或许间接也是阻碍同期台湾与以色列关系的障碍。本书也将探讨其他主要发生在亚洲并对中—以关系产生影响的事件，如：1950—1953年间的朝鲜战争；1956年10月英、法、以对西奈发动的进攻；1959年中国对西藏叛乱的军事行动以及随后达赖喇嘛逃到印度；同期中苏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和中苏边界争端的恶化，到1969年沿乌苏里江发生小规模战斗；中国内部的错误，主要有1958—1960年所谓的“大跃进”和1966—19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社会经济混乱；1979年2月开始的中越边境战争；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及随后的海湾战争；几乎同时发生的苏联崩溃和冷战结束；1991年马德里中东和平会议，首次使以色列、叙利亚、约旦—巴勒斯坦联合代表团公开参与了和平进程，中国也参加了后来的一些会议。

第一章是本书主编所写的，追溯了中华民国的领导人与现代

以色列的缔造者及以色列建国后的政治家之间的关系和不相往来的情况。当中华民国于通过 1911 年辛亥革命建国时，中国境内也有一些犹太人团体和一个锡安主义组织。它们一直存在到 20 世纪 40 年代。这些团体的成员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锡安主义组织成员同中华民国的领导人就一系列问题进行了交流磋商。这种联系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从 1917 年 11 月 2 日到 1945 年 6 月 8 日为第一阶段，锡安主义者争取并获得了中华民国对 1917 年英国贝尔福宣言的支持，中华民国也支持把贝尔福宣言的主要条款写入国际联盟对巴勒斯坦实行委任统治的章程（1922 年）和联合国宪章（1945 年）。第二阶段从 1945 年 6 月 9 日到 1949 年 2 月 23 日，中华民国官方对锡安主义的热情逐渐下降，其结果是它在联合国关于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和以色列取得联合国成员资格问题上连续投了弃权票。尽管 1948 年 12 月以色列和中华民国并未建立外交关系，但以色列还是在上海建立了一个办理犹太人移民的办公室。到 1949 年 2 月，大部分在华的犹太人都已移往美国、以色列和其他国家。第三阶段从 1949 年 2 月 24 日到 1950 年 1 月 9 日，是中以关系（1949 年 10 月 1 日后为台湾地区与以色列关系）的转型期，一方面，中华民国放弃了在联合国投票中弃权的做法，转而承认以色列并投票支持以色列取得联合国席位；另一方面，与此同时以色列却走向了相反的方向，继续保留其在上海的移民办公室，并承认中华民国的死对头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合法政府。第四阶段为从 1950 年 1 月到 1992 年 1 月 24 日，其间召开了万隆会议，台湾地区—以色列和中国—以色列之间的官方联系很少。在长达 42 年的岁月中，台湾地区和以色列以及中国和以色列之间除了偶尔有一些军火交易和商业往来外，都没有过什么官方谈判。台湾地区与那些不愿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谴责以色列和锡安主义的阿拉伯国家保持着密切的关

系。第五阶段的台湾地区—以色列关系开始于 1992 年 1 月 24 日。双方尽管未建立国与国意义上的正常关系，但却通过在台北和特拉维夫互设联络办公室来规范彼此的关系。以色列和美国都曾利用过这种非官方机制来处理同中国的关系，现在美国和以色列也应用这种准外交安排来处理与台湾地区的关系。由于以一中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以色列和台湾地区都对这一并非权宜之计的安排感到满意。

本书第二章所关注的是以色列与中国的初次接触，双方要解决的是帮助成千上万的犹太难民从先是中华民国后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移出的问题。上海有两个犹太人组织专门负责此事，一个是远东犹太人紧急救援委员会，负责从那些具备自费能力的犹太移民中筹集资金；一个是巴勒斯坦犹太人协会远东办事处（下称 PALAMT），负责处理有关移民其他大部分事务，其中包括把身患重病的犹太难民经第三国移往巴勒斯坦，以及处理希望移居以色列的混合婚姻组建的家庭等问题。例如，父母中有一人为非犹太人而子女为犹太人的家庭，或者非犹太人配偶去世、离异或已移居其他地方的家庭等。

远东犹太人紧急救援委员会代表、原上海犹太人伊萨多尔·马吉德讨论了生活在中国的前沙俄犹太人的困境。这些人 1917 年以后有的成了无国籍人员，有的持苏联、波兰、立陶宛或拉托维亚护照。马吉德还谈到了在上海居住了很长时间的巴格达犹太人社团，以及 1933 年后为逃避希特勒大屠杀而涌入上海的奥地利、波罗的海国家、克罗地亚、捷克、德国、匈牙利和波兰犹太人的情况。马吉德、PALAMT 主席沃尔特·西特林和其他锡安主义领导人清楚地看到，当时上海是欧洲屠犹风暴来临之际世界上惟一一座对犹太人敞开大门的城市，但是由于中国内战正酣，上海又不足以收容越来越多从欧洲逃来的犹太难民。在锡安主义者

看来，在巴勒斯坦重建一个犹太人家园是惟一可行的解决办法。

1949 年，马吉德建议以色列外交部在不久将被中国共产党控制的上海设立领事馆，这是一个有先见之明的建议。同年，马吉德被任命为以色列驻上海的名誉领事，这使他能够帮助成百上千的犹太人从中国移民以色列。但马吉德是苏联国籍，这就使这项工作变得复杂化。在上海这座共产党控制下的城市，他起初把这一身份视为一笔资产，而非羁绊。新加坡首任总理戴维·马歇尔是犹太人，也对此提供过帮助。在马吉德离开中国后的 1956 年，马歇尔说服中国让那些 1949—1951 年未能离开的俄国犹太人顺利移民。^[3]

马吉德谈到了苏联为迫使在中国的俄籍人士回归“苏联祖国”所运用的种种手段。毫无疑问，有些当时在中国的俄籍居民（有犹太人，也有非犹太人），之所以返回了苏联，是由于意识形态或苏联经济状况较好等原因。如俄国的高级汉学家尼古拉·斯皮什涅夫一家就属于这种情况。但大多数当时在中国的俄籍犹太人克服了苏联设置的种种障碍，移民到美国和以色列等国家，^[4]如现在以色列活跃在教学岗位上的高级汉学家埃里斯·约菲一家。随着这些犹太人移居世界各地，到 1999 年时剩下来永久居住在中国的西方犹太人已屈指可数。他们中的多数都加入了中国国籍并在思想上信奉共产主义，例如《中国建设》主编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最后离开中国前往以色列的俄籍犹太人可能是伊萨克·希克曼一家。他们在哈尔滨和北京居住过，1968 年离开中国。与此相关的犹太人遗留在华的财产到 1968 年时也基本得到解决，部分用契约转让给以色列国的由马吉德接收，或是原主人放弃了对产权的要求。到 1998 年，仍有一件 1949 年以前在中国的以色列人提出的财产要求，现正按司法程序进行裁决。一直留在上海的最后一名犹太人是雷波威奇，其原籍是俄罗

斯控制下的波兰的罗兹，1949 年以前就来到上海。他于 1982 年 1 月 3 日去世，终年 75 岁，当年 3 月被安葬于香港的犹太人墓地。^[5]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之后，几乎是一批全新的人物、集团和利益关系登上了舞台，最终导致了中国与以色列 1992 年建交。本书第三章探讨中以关系中的伊斯兰因素。利莲·哈里斯是一位研究中阿关系的知名美国学者，目前在苏丹定居。哈里斯探讨了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历史关系。^[6]她发现，在不同的时期阿拉伯人对中华民国（到 1949 年为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是不同的。

第一，哈里斯认为 1954 年以前是一个中阿“互不了解”的时期，并认为这是由于中亚近 500 年政治动荡，中国王朝无意西顾以及西方殖民主义阻隔造成的。这些因素“阻断了这两个地区间的联系”。而取得独立的阿拉伯国家也基本没有采取措施来弥补它们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无知。哈里斯称，直到 1997 年，“没有一所阿拉伯国家的大学开设中国学方面的学位课程，就连到中国旅游的阿拉伯游客也不多见”。

第二，哈里斯把从 1955 年万隆会议至 1971 年中国加入联合国视为态度明显不同的另一阶段，认为阿拉伯国家在这一时期对中国的态度是在巴结讨好和不知所措之间摇摆。一方面，令阿拉伯国家欣喜的是，中国尽管“注意到”1949 年以后一个独立的以色列国的存在，但却在万隆会议以后站到了阿拉伯国家一边。中国还在它同苏联，尤其是同印度（1959 年后该国帮助西藏的独立运动）的争斗中寻求阿拉伯国家的友谊。另一方面，令阿拉伯国家感到不满的是，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禁止中国穆斯林前往沙特阿拉伯朝觐。一些保守的阿拉伯国家对中国向也门、苏丹、阿曼提供轻型武器，支持当地的革命运动也很担心，